与顶级人才专业培养竞赛



宋小宁老师(左三)与获奖同学

背景：

2013年10月，由我校管理学院宋小宁老师担任教练的中大(学子)代表队一举夺得专业顶级赛事德勤税务精英挑战赛季军，至此创下了连续三年参赛跻身前三甲的罕有记录，中大及中大学子因之给业界留下深刻印象，受到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以下简称"四大")及各级税务部门的高度评价和赞赏，为中大税法教育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声誉。该赛事是由"四大"之一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主办的全国最高水平的税务筹划案例比赛，各大重点高校均十分重视。自2004年首届比赛举行至今，中山大学代表队先后获得冠军1次、亚军2次、季军3次，是全国高校中成绩最优异的学校。为此记者采访了宋老师，和他共同分享了成绩背后的理念。

采访/本报记者 李惠萍 黄旭珍

记者(以下简称"记")：为什么说德勤税务精英挑战赛是一个高难度、高水平的比赛？

宋老师(以下简称"宋")：这项竞赛有别于普通学业竞赛的地方在于它极具专业性，专注于运用税务知识来解决商业世界里的真实问题。现实中这些商业案例(问题)的咨询费可达百万之巨，通常由德勤合伙人、经理和咨询员团队合作完成，在比赛时却要求四个本科生合作完成，这对于参赛学生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且必须做对90%的考题，才有可能进入前三甲，后者的专业能力至少相当于在"四大"会计事务所工作一年以上。

比赛是非常激烈的，来自两岸四地包括北大、清华、港大、复旦等近70所著名大学同台竞争，可以说是个真正的精英选拔赛。

记：同学们如何看待这个高难度比赛？

宋：我对同学们说参赛不是为了获奖或者找工作，而要出于兴趣。多数同学会觉得税法学习枯燥乏味而对其敬而远之，我告诉他们，随着市场经济日趋规范完善，税务咨询在企业竞争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就"四大"来说，他们的审计业务在萎缩，税务咨询业务却在增长，现在进入"四大"的税务部门比审计部门要难得多。前不久，一位长期在美国工作的校友专门致电管理学院，建议学院加强税务教育，以与美国商学院接轨。在其他学校，税法教育常处于边缘地位，但在中大，学校、学院领导都非常重视，《税法》被列为学校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如此一来同学们对税法学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仅每次上课都积极占座，而且踊跃参加比赛。

记：报名者众多，如何选拔参赛队员有诀窍吗？

宋：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良好的分析能力是首要的，因此我们主要通过笔试选拔。试卷由上一年参赛的同学批改，因其对比赛特点最为了解。根据具体答题情况，选出最具潜力的十名同学。接下来，改卷的同学从中确定表现最佳者，由后者选出第二名队友，再由两名队员共同选出第三名队友，最后三人共同选出第四名队友。我和改卷同学只在必要时提出建议。这样做的目的是有利于团队成员相互间的熟悉和配合。2011年的参赛队伍中甚至有一名是传设学院的大一生，她在我开设的通识课上显得颇有灵气，于是我鼓励她参加比赛选拔考试，结果成绩比会计系的大多数学生还要好。现在她保研到中国传媒大学，立志做专业的税务新闻报道。

记：如何在短时间内提高学子们的实战能力？

宋：参赛队伍组建完成后，从7月初开始封闭培训，到10月中旬参加决赛。在100余天里，队员要阅读上千个税收文件，认真研究税收法规及案例，每天训练时间超过十个小时。然而即使这样，也不一定能取得好的成绩甚至小组出线，因此曾有同学说：这是一个虐心的比赛！

记：在长达三个月的封闭训练中，队员们在学习和心理上出现状况时怎么办？

宋：每一年的团队成员都不同，每个学生各有自己的特点，关键是要针对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情况及时、恰当地予以指导。

有一个队员非常聪明，专业基础很好，但不足之处是过于自信，不愿意参加集体封闭式训练，比赛结束后他才明白集训的必要性；集训一开始我就强调要努力训练，先做到小组出线，而该同学却不以为然，于是我提前让他们做模拟真题，他这才明白自己还没达到出线水平，这才开始潜心训练。又比如训练开始前，本应由他和队长共同申请南校区集训宿舍，但考虑到他的性格不适合，于是就让他专注于案例分析，而派队长独自去协调。结果两名同学完成得都很出色：队长几经周折成功地申请到宿舍，而另一位队员在集训中对如何准确运用税法分析案例，常常观点独到，带给大家很多启发。

记：如果队员们在训练过程中出现动摇或受到打击怎么办？

宋：各种动摇都有：训练的艰辛，学习的困难，考研就业等压力时时让队员们面临考验。

曾有一名队员因为学习吃力，觉得分析能力不及大家，一度想要退赛，我对她说：你的PPT展示风度好，现场反应够快，在决赛答辩时有利于稳定军心。这样，她就有了信心，最后在比赛中也确实是发挥了这个优点，评委印象很好。

还曾有个参赛学生，课堂表现很好，我常常表扬她，但她的期末考试却不如人意，但此后我还是经常表扬她，因为经过打击，她更需要鼓励，重拾信心。她是整个训练和比赛过程中发挥最稳定的同学，毕业后如愿以偿进入一家声誉极佳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税务部)。

在指导过程中，我倾向于摆事实讲道理，在点滴细节中让学生受到启发和鼓舞，让他们去理解比赛，理解别人，理解自己，去理解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就是说要因材施教，这是一个很朴实的理念，也是教育的本质。

记：比赛过程中如何让队员们调整心态，稳定地发挥？

宋：比赛过程确实是艰难的。2013年的初赛中大是和南开、复旦一起角逐，第一轮案例分析比赛过后，队员们自觉表现不佳，心情沮丧。我分析说：在下一轮竞答比赛方面，南开复旦是很逊的，并且他们的总体实力还不如过去两年与中大同在"死亡之组"的西南财大和中南财大代表队呢，你们要有信心。接下来竞答第二轮后，广外队处于优势，给中大小组造成很大压力，我安慰学生说广外参赛十年还从没有小组出过线，不用怕。结果一周后成绩公布，中大队以小组(共12支队伍，取前2名)第2惊险出线。

虽然出线了，但学生对决赛却不抱信心，因为案例分析方面确实表现不太好，而决赛是只比案例的。这时我把过去两年的初赛及决赛三甲名单发给他们，同学们发现初赛表现最好的队伍竟然有三分之二最后未进入决赛三甲！就这样重新燃起了他们的信心和热情，进入到积极备赛的状态。

总的说来，我希望藉这个过程让同学们学会处变不惊，冷静地观察，分析和思考，养成透过表象看本质的习惯。

记：比赛中同学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宋：我觉得比赛后，队员们收获的远不止是税务专业知识，还从中学会了如何思考判断、如何反思反省，相互间如何合作与信任，特别是学会了感恩、包容和勇于担当，当然也收获了巨大的荣誉感。

我常常向学生提起前任教练傅凝洲老师，他曾带队参加2004、2005年的比赛，并荣获亚军和冠军，他后来离开中大成为德勤中国税务合伙人后，依然十分关心中大的比赛情况。有几年中大没有队伍出线，他非常着急，主动让曾经参赛的同学回来辅导。傅老师说，看起来只是一个专业比赛，但它带动的是中大的税法教育，他很感恩在中大曾经的时光，希望中大的税法教育能不断向前发展。

比赛对同学们的影响也很大，参赛同学在日后的工作中均相当出色。首届队员中有一名32岁就担任了广发证券的副总裁，还有同学成长为"四大"的高级经理，不少同学拿到了著名企业的offer。

记：您不遗余力地带领同学们参加比赛，此外还有繁重的教学工作，是否担心耽误和影响科研或者晋级？

宋：我的课堂教学工作量达500多学时，远远超过学校规定的220学时，参加比赛所费的时间尚不计在内。对教学的这种热情主要是出于兴趣和责任感。我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当天的税法更新，不然课堂上讲的可能就是过时的甚至错误的内容。

平时我与四大合伙人及所教的MBA学生交流频繁，能及时获取业界最新的状况，这些往往被即刻转化为课堂最新的教学案例，可以激发和增强同学们的专业兴趣和学习能力。当前对大学生的培养囿于各种现实条件，无法做到小班教学因人施教，个性培养，而课堂之外组织学生参与竞赛是一个良好的途径，这既是管理学院各级领导的共识，也是我持续带领同学们参加比赛的初衷。

事实上，认真对待教学工作也给我带来了积极影响。首先是对税法的理解更深了，其次由于比赛连年取得佳绩，中大的税法教育也无形中在各界积累了良好的声誉，作为带队教练，我常被邀请与省国税局、国家税务总局合作展开课题与教学，从中也收获很多。

不功利地做一件事情，却有意外的收获，这是事先没想到的。

86岁离休干部身后捐角膜

文/中山眼科中心党办

2014年3月7日，一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附属眼科医院原副院长晶岩同志，在走完了她86年人生历程后，为眼角膜病盲人留下了一份爱心厚礼：把自己的双眼角膜捐献给设在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的广东省眼库。

晶岩，原名矫恒岚，1928年2月生于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县一个中农家庭。晶岩有7兄妹，她排行老二，6岁时便懂得主动帮助母亲照顾弟妹们，并做一些家务劳动。晶岩8岁开始由姑母抚养，1939年姑母加入党组织后，家里经常有地下党同志往来。为了工作的方便，他们常带着她作掩护，并让她做一些与附近村子联络的通讯工作。大人的言谈和行动，使年幼的晶岩潜意识里已初步认识到这是正义的斗争。1940年冬天，八路军进入胶东地区，一切呈现出新的气象。晶岩进入当地小学就读六年级。在学校进步教员的教育引导和姑母实践活动的启发下，晶岩对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她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并担任儿童团长的工作。1942年6月，经一位初小时期的老师介绍，晶岩加入了党组织。晶岩在自传中诚恳地说道："入党后我认为我成了党的孩子了，我愿意为党做一切工作，甚至是最危险的工作。同志们给我许多鼓励和教育，使我深深觉得党就是我的依靠，我一定能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为一个好党员。"

1942年8月后，晶岩先后进入胶东女子中学和北海联合中学学习。1944年11月后，在胶东新区开始参加实际工作，1945年5月至1947年6月，在莱阳中学(后改为胶东公学)工作和学习。1947年7月至1948年2月，先后调到胶东支前政治部、胶东北海银行工作。

1948年3月后，晶岩先后调到中共东北局妇委和东北第一毛织厂工作。在东北局妇委工作期间，晶岩深受中国妇女革命的先驱蔡畅大姐的影响和熏陶，连"晶岩"这个名字都是蔡畅大姐建议改的。

在东北工作时期，在一些久经锻炼的同志的帮助和鼓舞下，晶岩积极努力工作，提高了工作能力和政治思想水平。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党员，能够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让自己的一生不是平白虚度而是光荣的一生。这些想法，使晶岩加倍努力学习，在1950年4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是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在人民大学的4年里，晶岩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和外交业务知识，显著地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大学毕业后，晶岩被组织上分配到习仲勋兼任局长的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工作。

1958年后，晶岩随丈夫邓羽洁调到广州工作。她先后在中山医学院医疗系、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石坝和连山干校、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中山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工作。1978年3月至1979年12月，任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党总支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12月至1984年12月，任中山医学院附属眼科医院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1984年12月在中山医学院中山眼科中心离休。

晶岩生前曾经深情地说道："回顾我的生命历程，心情是很激动的。是党培养了我，教育了我，是党赋予我的生命以伟大的意义，勤勤恳恳地工作，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这是我的志愿"。

晶岩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对党的诺言，更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作为眼科医院的老领导，她深知有无数角膜病盲人在黑暗中等待着珍贵的眼角膜，期盼着重见光明的那一天。她的老伴邓羽洁也是一位新四军老革命，老两口健在时就决定在身后捐献眼角膜。当2002年9月邓羽洁病危时，他的女儿便在母亲的支持下，来到广东省眼库签署了角膜捐献志愿卡。邓羽洁病逝后，随即在病房捐献了双眼的角膜。而今，晶岩又以同样的方式为眼角膜残疾人奉献了自己的眼球，为他人带来了重见光明的机会。

晶岩的子女们深受父母的感染，他们真诚地表示：之所以愿意为敬爱的父母亲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是觉得逝去的亲人还能够透过他人的眼睛继续看世界，感到他们还活着。他们期待父母的生命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延续，期待父母的灵魂、爱心永存，父母的人生将变得更有意义，更加伟大。与其化作灰烬，不如留下光明。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和支持并加入身后捐献角膜的行列。

我的伯克利之行

文/博雅学院 陈琪

在美国的这半年，令我感触最深的是美国学生认真、好学的态度。



陈琪同学(左一)

2013年8月底，带着好奇、兴奋和忐忑我踏上了伯克利的土地，开始了为期半年的交换生生活。伯克利是位于加州北部，临近旧金山的一个小镇。全美最顶尖的公立学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座落在这个植被茂盛，气候宜人的小镇上。

一、不一样的学习

初到伯克利，就被"兵荒马乱"的开学选课周着实吓了一跳。伯克利每学期开学的前两周，是被学生称为"class shopping"的时间。学生会试听很多门课程，在一一比较之后再确定最终的选课结果。因为伯克利优先保护本校生的选课权利，所以我们交换生只能在伯克利学生都确定选课结果之后，才能去"抢占"剩下的座位。交换生们有至少要选三门课程的最低要求，不然签证方面会出现问题，因此为了确保能选够课，交换生都要选几个"备选"课程。为了兼顾最心仪的课程和"备胎"们，几乎所有交换生都只能在开学第一周同时上五六门课，并且完成这些课的阅读材料。在教学楼间暴走和埋首在阅读材料堆中是我在伯克利头两周最主要的活动，加上繁琐的注册手续和初来乍到的生活琐事，生活太过充实，以至于朋友问我想不想家的时候，我只能无奈地回答，没空想。

在伯克利的学习是非常快乐的。我只选修了三门社会学系的课，因此相较于国内，可以在每门课程上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学得更细致、深入。加之三门课都是感兴趣的科目，学起来也就非常带劲。博雅的学习对于我适应伯克利的教学帮助极大，当其他中大交换生还在为巨大的阅读量叫苦不迭的时候，博雅教育的锻炼使得我可以轻松地迈过"阅读材料"这道坎，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理解具体的课程问题上。

伯克利给一些学习任务比较重，学生比较多的课程安排了讨论课，讨论课一般每周两次，由博士生担任的GSI负责组织。讨论课一般旨在梳理课堂上不易理解的知识点，在确认大家都理解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延伸。对于我来说，讨论课是融入美国大学课堂的重要方式。在课堂上听到的基本都是老师的想法，在讨论课上，才能更多地接触到美国学生的想法，和他们进行交流，且很多知识盲点往往是在讨论中显现的。

班里的学生由GSI们"包干到户"：作业、考试均由相应的GSI批改，论文指导、学习问题也基本找GSI解决。在我学习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这门课程时，GSI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我因为历史知识匮乏，而且之前没有社会学方面的培训，理论基础全靠一边上课一边补，所以有时材料看得半懂不懂，上课时也偶尔"断片"，幸好有GSI课后的帮助，帮我理顺了很多被混淆的知识点，也更正了很多误区。教授的学生很多，不可能关注到每一个人；而GSI则会留意他们负责的每一个学生，指出他们学习中的问题，及一些知识上的误区，让我受益匪浅。

此外，伯克利有很多的学生志愿组织和互助项目，我最欣赏的是他们的writing tutor program。每天固定时段会有一些写作能力强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在学习中心帮助辅导论文或者作业。需要帮助的学生到现场拿号排队，每个人可以获得半个小时左右的辅导时间。我初到伯克利的时候，因为不熟悉英文写作的格式和文章布局，第一次作业分数特别低。writing tutor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让我的文章条理清晰了很多，分数也自然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二、不觉而生的赤子心

在美国的这半年，令我感触最深的是美国学生认真、好学的态度。尽管老师从不点名，但是(除了期中考的那一周之外)所有课程的学生出勤率非常高，旷课的人很少。课上看自己的书，讲话的基本没有，大家都在很认真地听。每周的office hour也是排得非常满，经常预约不到。学生们选课也从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方向，只要感兴趣的，都十分认真地学习。伯克利共有大大小小二十几间图书馆，还有专门的本科生自习图书馆。这些馆内的自习座位即使在非考试周，上座率也非常高。每天晚上，图书馆内有一半以上的位子是满的。

大学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人才来源，大学生不奋发，国家又怎么强大。我很庆幸我的大学是在博雅学院度过的，博雅学风很正，大家都认真好学，自我要求高。

大家都说，出国后会比较爱国，的确是这样。在国内，爱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抽象的概念；看着诸如贪腐、污染、道德败坏的现象，对中国也充满了恨铁不成钢的愤懑。可是身在异国他乡，中国人就成了我身上最显著、最突出的标签。陌生人之间谈论到我，不会说that girl in black，或者that girl with pony tail，永远都是that Chinese girl……，于是突然间就有了一种使命感，觉得我代表了国家的形象，而且要努力维护国家、民族的形象。

在美国，适逢华人群体举行抗议BBC节目中"杀光中国人"言论的活动，BBC的恶劣态度和华人的团结每每激起我心中的赤子之情。但是，每当我看见唐人街质量低下的产品和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心中又觉得五味杂陈。如何让身在海外的华夏儿女腰板越来越硬，越来越为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如何能让西方人对中国人这个群体，这个民族肃然起敬？我能为此做什么？你又能为此做什么？

三、"另类"的老师

我在伯克利接触过的老师都非常友善，也都很耐心，他们都非常可爱。既有超爱笑的土耳其帅哥，也有在讲台上蹦蹦跳跳的组织社会学老师，还有我最喜欢的性别社会学老师。

性别社会学的老师叫Jill Backhorn，她完全颠覆了我之前对大学教师的既有认知。Jill留着红色挑染(后来变成了紫色)的莫西干头，夸张的耳环，左手手臂上覆盖着超大面积的彩色纹身，每天的衣服、鞋子都是精心搭配的，富有特色，色彩斑斓，还有七八块形状、颜色各异的手表搭配服装。如果不是在课堂上见到她，我绝对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任教于全美高校排名第一的社会学系的老师。

虽然穿着另类不羁，但Jill在工作上却非常严格认真。比起其他老师宽松、欢快的教学方式，Jill对待教学和作业一丝不苟，极少在课堂上开玩笑，还会厉声责备在课堂上讲话的同学。但私下里她对同学们也非常亲切和蔼。

喜欢Jill，除了她本人的因素外，还因为她教授的这门课给我带来了很多启迪。中国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把嫁人视作女性人生的头等大事，"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得好少奋斗20年"等观念至今仍然是很多女性笃信的"箴言"。对外表的过分重视，以及对浪漫爱情，对被保护的渴望在同龄人中非常普遍。可是因为外婆的缘故，我自小就对这种思想很排斥。

我的外婆是一个聪慧通达的女子，可因为家里重男轻女，被迫早早辍学，嫁人的时候她选了虽是富农出身，但是来自书香门第的外公。但婚后的生活却很不幸福，外公在她面前脾气暴躁，大男子主义，让外婆蒙受了许多痛苦。我一直认为，外婆的不幸，皆因为被旧社会的封建思想所害，没机会接受教育，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

生活在21世纪的女性，教育已经得到普及，亦没有阻碍女性独立自主的制度、风俗约束，为什么还要将自己的幸福寄于别人身上？这等于是牺牲独立人格换取经济上对他人的依赖。

在性别社会学的课堂上，我学习了系统的性别平等的理论，了解了男女平等观点的理论基础，更加坚定了自己原先的信念。同时也认识到无论是成为事业型女强人还是相夫教子，皆是各人的选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可以轻易蔑视他人。但是每个女性都应该知道自己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被传统文化或者他人的价值观引导，被动地放弃生活的诸多可能性。因此，我决定将性别社会学作为学习方向，去发现更多性别和性向中不平等的现象及其起因，尽我所能为性别平等去做些渺小的贡献。

四、校园之外

除了学校里的心得与收获，校园外的体验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感想。美国对残疾人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感触颇深，每个细节都洋溢着人性化的关怀。残疾人的电动轮椅基本由政府出钱配备，所有的公共设施，都有考虑到残疾人的需求：几乎所有电梯和推门都设置了方便坐轮椅人士使用的开关，公共汽车都配有针对轮椅的升降装置……在乘坐公交车时，每个人都会安静地等到司机将残疾人士的轮椅固定好才排队上车，对待残疾人的态度非常友善，甚至会比对待一般人更热情，但是这种友善是一种基于平等的尊重，而非怜悯或同情。

当然，美国人民也不总是热情友善的。受到加州淳朴热情民风的影响，我在伯克利养成了跟陌生人打招呼的习惯，但是在纽约，我的"Hi"常常被无视或者换来诧异的目光。纽约人乱穿马路无视红灯的行为也让我非常讶然，看来不遵守红绿灯并不是什么欠发达地区人民才有的陋习嘛。

另外，虽然美国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国度，但是偶尔遇到的几次歧视还是让我很生气。不过仔细回想起来，这些歧视都来自美国社会底层的墨西哥人或者黑人。理论上讲，受歧视最多的人群，应该最痛恨歧视；但事实是，越是受歧视的群体，越喜欢通过歧视他人来满足某种病态的虚荣和自尊。这还真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